

漢學內部的「漢宋之爭」

——從陳澧的「漢宋調和」看清代思想史上

「漢宋之爭」的深層涵義**

張 循*

摘 要

陳澧是晚清倡導「漢宋調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考察他的「漢宋調和」論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儘管陳澧不斷強調「宋學」的不可或缺，但他接受的只是宋儒的重視義理的治經傳統，至於宋儒的理學則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所關注的「宋學」並不是指宋明以來的理學，他一生亟亟從事的「漢宋調和」，其實是在處理清代漢學內部的問題，其目的不過是要強調與重申「由考據而通義理」這一漢學原本的治學理念。所謂漢學的內部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是治學中「文學」（治經）與「德行」的分離，第二則是「文學」之中「考據」與「義理」的緊張。針對兩個不同層面的「漢宋」問題，陳澧採取了「兩通之」與「兩分之」的不同調和方式。可是他的努力卻難以得到並世漢學諸人的理解，他的尷尬處境反映了漢學理念與漢學實踐之間的脫節。這種脫節正是清代「漢宋之爭」的根源所在。因此，漢學的內在矛盾才是清代「漢宋之爭」在思想史上更深層次的涵義。

關鍵詞：清代、陳澧、漢學、宋學、漢宋之爭、考據

收稿日期：2008年6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21日。

* 作者係四川大學歷史系講師。

** 本文修改過程中得到諸位匿名審稿人的悉心指正，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一、引 言

如所周知，清代漢學與理學之間的對立構成了一種「漢宋之爭」。梁啟超認為，「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學術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¹在此意義上，整部清學史就可以被理解為一部「漢（清學）宋（理學）之爭」的歷史。在梁氏之後，胡適也持大致相同的見解。梁、胡二氏皆屬影響廣大的人物，可以說，自梁、胡以「反理學」來概括清代儒學特性之後，研究者的眼光大多就投注在漢學與理學之間，「漢宋之爭」即是漢學與理學的衝突幾乎成了已知的前提而不是待證的假設。²

不過有些研究者已經觸及了某些疑點。如暴鴻昌謂：「乾嘉時代漢學家卻屢遭同代學者之攻難，被斥以門戶之偏，細檢各家所論，令人驚奇發現，這些責難文字竟不是來自宋學家，而是來自文士。……如果把乾嘉時期攻擊漢學最厲者列舉出來，那麼應是袁枚、蔣士銓、錢載、姚鼐、王芑孫等。但以上諸人無一為理學家，而為文士，即詩文家。」³王家儉也發現：「將近一個世紀以內，漢學家雖然對宋學展開全面的攻擊，可是除了桐城派的古文家，如姚鼐、方東樹等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外。在當時的理學家當中，卻很少有人提出系統而有力的答辯。」⁴

他們不約而同觀察到的現象足以給我們一個提示：漢學與理學的對立固然是一種「漢宋之爭」，但反過來，「漢宋之爭」的內涵卻不單單是指漢學與理學的對立，否則「當時的理學家當中卻很少有人提出系統而有力的答辯」就將成為不可理解的事。而理學家的缺席這一現象本身也就提示我們，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鈺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6、91。

2 黃愛平，《〈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兼論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中國文化研究》1996.冬：44-49。魏永生，「清中晚期漢宋學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車冬梅，「晚清理學學術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其他相關論著尙多，不能遍舉。

3 暴鴻昌，〈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1997.2: 67。

4 王家儉，〈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見氏著，《清史研究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78。

漢學與理學的對立恐怕也並非「漢宋之爭」的核心意涵所在。那麼，「漢宋之爭」在思想史上是否具有更深層次的涵義呢？本文將通過對陳澧（1810-1882）「漢宋調和」論的考察，來對這一問題試做回答。

二、陳澧「漢宋調和」的性質

道、咸以降的清代思想界，「漢宋調和」論盛行一時，而廣東的陳澧是其時最重要的「漢宋調和」論者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調和「漢學」與「宋學」是陳澧一生心中積慮的頭等重大的問題。但當我們讀了他作於道光十八年（1838）的〈答楊黻香書〉之後，⁵就會感到他的「漢宋調和」頗有些異樣。

陳澧在〈答楊黻香書〉中云：

夫治經者將以通大義，得其時用也。若乃小學一道，經術首基，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蒼》《雅》甫明，華顛已至，窺堂陟奧，俟之何年。又儒者之書，多宏博之篇，寡簡易之作，可資語上，難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雖有學山之情，半為望洋之歎。後學未振，或此之由。⁶

這段話明確表達了陳澧兩方面的憂慮。一則近儒治經「咸知考索」而鮮「通大義」，是不知由考據以通義理；一則經學繁奧，沒有適合初學者的「簡易之作」，導致「後學未振」。而第一方面，即關於治經中須打通考據與義理，正是他此後畢生致力的「漢學」與「宋學」的問題。咸豐元年（1851），其有〈與徐子遠書〉云：

來示云，百餘年後，士不復區分漢宋，到此自是勝境，其流弊則有淺嘗之病，過此以往，又不知作何補救之法。澧則謂此病已見，不待百餘年後矣。……欲如來示所云義理、考證合而為一，恐不易耳。如能補小學工夫，則漢學、宋學皆有基址，然後可以義理、考證合為一矣。⁷

這段文字中的「士不復區分漢宋」顯然就是「義理、考證合而為一」之意，

5 有關陳澧文字繫年，除原文明確可考者外，皆據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輯第763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6 陳澧，《東塾續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輯第762種），卷4，頁141。

7 同上註，頁174-175。

然則區分開來的漢、宋固然就是「考證」、「義理」。所以由此可以明見，考據與義理正是他欲「合而為一」的一組漢學與宋學。又如陳澧嘗在筆記中說：「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為言者，試問為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世之不學者……而欲入於作者之林，則詆考據而言程朱。」⁸這是他直稱考據為漢學。緊接此條之前他又說：「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⁹這正是以宋學補漢學之意，可見義理固即所謂宋學。

與此同時，〈答楊黻香書〉中還有一層字面所未明言的信息。按此書作成的道光十八年，陳澧年二十九，而其《學思錄》〈自序〉有云：

余少時志為文章之士，稍長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三十以後，讀宋儒書。¹⁰
又其《朱子語類日鈔》〈自序〉云：

澧早年涉獵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¹¹

陳澧晚年又作有《自記》一卷，「自一歲起，凡行事著述讀書輒記一條或三數條，至六十二歲止」。¹²在該書三十五歲條下，他明確記到：「初讀《朱子文集》。」¹³據此可知，作〈答楊黻香書〉時的陳澧尚未真正接觸到宋儒之學。還沒有真正讀過宋儒書的陳澧卻發出調和漢、宋之論，這不能不讓我們懷疑，他的漢宋調和論究竟同宋儒之學有多大關係？

但正因為陳澧中年以後的學問裏參入了宋儒之學，所以我們還不能立刻保證說他所謂的「宋學」始終與宋明理學無關。而且與此同時，另一組漢學與宋學也是他調和的目標。同樣在〈與徐子遠書〉中，他說：「自宋以來，學術迭變，固由風氣之轉移，亦由門戶之爭競。……然門戶之爭，總不出孔門之四科。德行，道學傳也；言語，文苑傳也；文學，儒林傳也；政事則大而將相、小而循吏傳也。」繼謂：

德行、文學，即宋學、漢學兩派也。此兩派者，其末流之弊皆入於無用，然

8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191。

9 同上註，頁191。

10 汪宗衍，《年譜》，頁68。

11 同上註，頁87。

12 同上註，頁131。

13 同上註，頁35。

使四科之人不交爭而偏廢，則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談理學，埋頭而治章句，皆大有益於世，無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從之，則或爲空疏，或爲繁碎，不但無用且有害矣。¹⁴

從以上引文來看，這一組漢學與宋學被他稱爲「德行」與「文學」，同時他又說「德行，道學傳也」，又將二者對比爲「談理學」與「治章句」，似乎表明他這裏所謂的宋學（德行）正是指宋明理學。如此實在不免令人疑惑：陳澧所謂的「宋學」與宋明理學究竟是一是二呢？這個問題已經不是靠羅列字面證據所能解決，而必須通過瞭解他對宋儒之學的認識才能確定。

據陳澧自述：

少時祇知近人之學，中年以後，知南宋朱子之學，北宋司馬溫公之學、胡安定之學，唐韓文公之學、陸宣公之學，晉陶淵明之學，漢鄭康成之學。¹⁵

他自謂「三十以後，讀宋儒書」，受到宋儒的影響，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他最欣賞的宋儒是朱熹、司馬光和胡瑗。之所以能這樣肯定，是因為他拈出這三個宋儒絕非率爾及之，比如他又說：

「學之爲言效也」，必當尋師，尋師則必求之古人。鄭君也、陶令也、陸宣公也、韓文公也、胡安定也、司馬公也、朱子也、顧亭林先生也。¹⁶

注疏、陶、陸、韓、胡、司馬、朱，細讀諸家書，此是求聖人之路。¹⁷

可見他言及宋儒則必稱朱、胡、司馬，他對這三家之學的理解即代表了他所接受的「宋儒之學」。

胡瑗和司馬光都是北宋二程理學傳統形成之前的人物，此二人在陳澧心中的地位是二程遠不能相比的。陳澧嘗表示：「以胡安定之教爲教，以司馬溫公之學爲學，乃北宋之學之醇而無弊者也。」¹⁸則他欣賞的是胡瑗的教學之法和司馬光的治學之方。他曾在《學思錄》中節錄了一段黃震《黃氏日鈔》中論胡瑗的文字，並加以自注和按語，從中可見其欣賞的「胡安定之教」的具體內容：

14 陳澧，《東塾續集》，卷4，頁175-176。

15 汪宗衍，《年譜》，頁33。

16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72。

17 同上註，頁171。

18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筆記遺稿〉，《嶺南學報》5.3-4(1936.12): 16。

先生胡氏名瑗，……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此文學也），好談兵戰者（此政事也），好文藝者（此言語也），好節義者（此德行也），使各以類群居講習。

愚敬慕胡安定過于二程。此條於《論語》四科條下引之，此教人之定法也。¹⁹

整理〈陳蘭甫先生（澧）遺稿〉的楊壽昌在這段文字下有按語謂：「先生最重《論語》四科之義，《東塾讀書記》卷二〈論語〉，論四科之義者凡兩葉。」²⁰陳澧又嘗著有〈四科論〉一專篇，其大意從前引〈與徐子遠書〉已可得知。所以胡瑗之見賞於陳澧，端在其教學之法與陳氏所持孔門四科之意有暗合，而非因其為理學傳統中的「宋初三先生」之一。至於司馬光，陳澧在〈傳鑒堂記〉中說：

澧嘗竊論北宋之學，後儒皆尊二程子，然司馬氏之學不在程氏下。學者讀《孝經指解》、《家範》、《書儀》以治身治家，讀《通鑒》以知天下治亂興亡，可以為士矣。至平至實至博至約，不講道學而道學莫真焉，不矜文章而文章莫大焉。²¹

則他對司馬光的欣賞，其角度也與理學無關。他又有筆記謂：「《宋元學案》〈司馬溫公〉，陳忠肅〈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邵）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司馬溫公豈惑於此等學問哉！」²²可見他完全將司馬光放在理學形上傳統的對立面，然則「不講道學而道學莫真焉」，也未嘗不是陳澧的夫子自道。²³

19 同上註，頁3。

20 同上註。

21 陳澧，《東塾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頁266上。

22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筆記遺稿〉，《嶺南學報》5.3-4(1936.12): 18。

23 按劉恭冕（1821-1880）〈劉叔俯致劉恭甫（壽曾，1838-1882）書〉云：「近儒喜斥宋儒先、後天之說。然《易》〈繫辭〉言乾為西北之卦，而〈先天圖〉謂乾南坤北。蓋西北之說，中國小地球也，乾南坤北則合大地球為之。似先天之說不誣。族弟佛青極然鄙說，特此奉聞。並問近佳。」見《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四號（光緒三十一年四月），頁4a。據此可見劉恭冕並不反感「先天」之說，他既「特此奉聞」劉壽曾，則劉壽曾當也非「喜斥」此說者。而陳澧對此說的反應是「司馬溫公豈惑於此等學問哉！」憤激之情畢見乎辭。可見較之寶應、儀徵兩家劉氏漢學世家中人，陳澧對宋人理學之說乃更不予同情。

然而最能說明陳澧所接受的宋儒之學與理學無關的，恐怕還是他對朱熹的看法。在談到其《學思錄》的撰作義例時，陳澧說：

《學思錄》於宋道學獨尊朱子。非不專（尊？）周子也，《太極》無用，《通書》亦不及《論》、《孟》、《禮記》也。二程可取者固尊之，至其偏駁者不取也。如《定性書》，實無取焉。惟尊朱子而已，朱子雖尊周、程，今不能因朱子所尊而過尊之。²⁴

這裏對周、程的評價再次體現了陳澧對理學傳統的疏離。他說「於宋道學獨尊朱子」，他對朱子的「道學」又是如何理解的呢？陳澧嘗「自列《學思錄》大指凡四十四條」，其中第七條為「明朱子之為漢學」。²⁵這條大指當與其〈與袁卿書〉一通合看：

來書謂朱子用漢儒家法，此語最有識。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此漢人語，宋人所無；注《論語》尤似漢人，如「巧、好，令、善也」，乃毛《傳》之法。僕嘗謂朱子乃宋儒之講經學者，道學家不知也，漢學家亦不知也。²⁶

所以他完全是從「經學」、「漢學」的視角來觀察朱子，專取朱子學問中與漢儒相似者為論，對朱子所繼承的周、程以來的理學傳統則根本無意顧及。《東塾讀書記》〈朱子書〉一卷，即累累皆是言。陳寅恪謂：「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²⁷其言甚是。既然陳澧視「朱子之為漢學」，又「於宋道學獨尊朱子」，則他講求的「宋道學」其實也仍舊是「漢學」。

因此儘管陳澧在中年以後好讀宋儒書，但他接受的基本都是宋儒的部分治經傳統，至於宋儒的理學則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所關注的那個「宋學」並不是指宋明以來的理學，他一生亟亟從事的「漢宋調和」，其實是在處理清代漢學內部的問題。用陳澧的話來講，這個內部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治學中「文學」（治經）與「德行」的分離，第二個層面則是「文學」之中「考據」與「義理」的緊張。

24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65。

25 汪宗衍，《年譜》，頁69。

26 陳澧，《東塾續集》，卷4，頁172。

27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三〉，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附錄」，頁439。

三、「兩分之」與「兩通之」：陳澧漢宋調和的兩種方案

浙江定海的黃式三（1789-1862）、黃以周（1828-1890）父子是與陳澧大致同時的漢宋調和論者。黃以周嘗有言云：

今之調停漢宋者有二術，一曰兩通之，一曰兩分之。夫鄭、朱之說自有大相徑庭者，欲執此而通彼，瞽儒不學之說也；鄭注之義理時有長於朱子，朱子之訓詁亦有勝於鄭君，必謂訓詁宗漢，義理宗宋，分爲兩戒，亦俗儒一孔之見也。茲奉鄭君、朱子二主爲圭臬，令學者各取其所長，互補其所短，以求合於聖經賢傳，此古所謂實事求是之學，與調停正相反。²⁸

黃氏說自己溝通漢宋是「古所謂實事求是之學」，與一般「調停漢宋者」有別，其實在旁人眼裏，他們父子二人與「調停漢宋者」並沒有多大區別，否則他就不必亟亟爲自己辯解了。²⁹對本文來說，這段話的作用在於告訴了我們時人調和漢宋的方式大致有兩種，或者是「兩通之」，或者是「兩分之」。前者強調漢宋二學是大同小異，不能此疆彼界地分割開；後者則申明漢學與宋學的確不一樣，必須各自分開而各有所主。黃氏這裏所講的漢宋是專在「考據」與「義理」的層面，但他指出的兩種調和方式並不僅僅限用於這一層次。例如在「文學」與「德行」的層面上，惠氏紅豆山房的「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又何嘗不是一種「兩分之」的漢宋調和呢。下文裏我們將會看到，陳澧在進行「漢宋調和」的時候，即在不同的層面上分別採取了「兩通之」與「兩分之」這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文學」與「德行」的層面：兩分之

前引〈與徐子遠書〉中，陳澧在言及「自宋以來，學術迭變」總不出孔門德行、言語、文學和政事四科之後，³⁰接著說道：

28 黃以周，《敬季雜著》（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刊本），〈文鈔六·南菁書院立主議〉，頁33a。

29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云：「近世以來……有調停漢宋者，亦不過牽合漢宋，比附補苴，以證鄭、朱學派之同。」自注：「如陳蘭甫、黃式三之流是也。」又鄧實《國學今論》謂：「晚近定海黃式三、番禺陳澧皆調和漢宋者，然摭合細微，比類附會，其學至無足觀。」見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75、340。

30 按《論語》〈先進〉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無，故孔門兼收而不偏廢，尤不交爭。爭則有勝負，有勝負則必偏廢，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論〉一篇，以明此意，欲學者各因所長以成其學。然言語政事文學固斷不可無德行，而德行言語政事又斷不能不由學而入。德行、文學，即宋學、漢學兩派也。³¹

從這裏可以明顯看到，在「文學」與「德行」的層面，陳澧是依照所謂孔門四科之法來進行「漢宋調和」的。按《東塾讀書記》〈論語〉，可知其總的綱領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榘濟，或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³²而此綱領落實到治學的具體操作上則是：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³³

這兩段文字，將其「兩分之」的調和手段闡述得明白無遺：無論德行（宋學）、文學（漢學），「專學一科，不誤也」。

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陳澧何故能提出四科論來緩解「文學」與「德行」的緊張呢？他的這種「思想」是從何而來的呢？「思想」絕非憑空產生，它和思想者周遭的歷史與環境密切相關。因此這顯然是一個思想史應該追究的問題。

陳澧當然有可能是在讀《論語》時直接受到啓發，心中蘊積的問題與眼前的文字發生共鳴。但其時之讀書人無不誦《論語》，爲什麼偏偏是陳澧對此特爲致意，進而大加發揮爲「專學一科」之學呢？³⁴有一個必須引起注意的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謂孔門四科。劉寶楠（1791-1855）、劉恭冕，《論語正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頁238。

31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4，頁175。

32 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論語〉，頁14-15。

33 兩段皆見陳澧，《東塾讀書記》〈論語〉，頁16。

34 同樣倡導漢宋調和的曾國藩（1811-1872）也曾用孔門四科來比附當時諸種學術，但並未發揮出「專學一科」之論。他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中說：「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

事實，通過前引陳澧對胡瑗的推重之辭可以看到，四科之學在他那裏不僅是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教學的方式。這不能不讓我們聯想到他早年的受教之所——學海堂。陳澧於道光十四年（1834）被選入學海堂，為該堂的首屆專課肄業生。專課肄業生制度很值得我們關注。據《學海堂志》〈課業〉記，道光十四年，兩廣總督盧坤（1772-1835）節諭學海堂，增設專課肄業生十名，箇中言此制要點在：

宜令學長于所課諸生中舉其尤異，教以顛門。……各因資性所宜，聽擇一書專習。……課業諸生于《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擇一書肄習，即於所頒日程簿首行注明習某書，以後按日作課，填注簿內。³⁵

不難發現，這裏所謂的「教以專門」、「各因資性所宜」等教學法，與陳澧建立在「性各有所近」基礎上的「專學一科」的四科教學法，其精神意趣正是同條共貫的。但陳澧並沒有在其文字裏明確表示過他的四科教學法是受啓於學海堂的專課生制度。雖則如此，朱一新（1846-1894）的一段話已足可為我們提供一個旁證。朱氏在其〈擬星岩書院章程〉的「學規」一目下謂：

今略仿學海堂專課生之例，但不立專課名目，分經學、史學、詞章為三科。小學、性理，經學之屬也；輿地、掌故、算術，史學之屬也；古文、駢文、詩賦，詞章之屬也。發題不過此數門，諸生各就性之所近者，或專治一門，或兼治數門，各自量材力為之。³⁶

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筭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盡廢也。」朱東安選注，《帷幄辭章——曾國藩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頁302-304。其意在以義理為中堅，而其他三科亦「未敢盡廢」，與陳澧「四科之學……不可妄談」的「專學一科」之意大不一樣。

35 林柏桐、陳澧，《學海堂志》「課業」條，見趙所生、薛正興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3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295上-下。

36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卷下，見氏著，《拙齋叢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第27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1711。

這裏經學和辭章，即相當於陳澧四科論中的文學、言語兩科。至於史學一科，據朱氏之弟朱懷新（光緒十五年進士）說：

（兄）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尤要。³⁷

可見朱一新以輿地、掌故等為內容的「史學之屬」，實有其「致治」的目的。朱一新又嘗謂：「《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即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為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³⁸由此朱懷新的話完全可以得到其兄本人文字的證實。所以「史學之屬」即相當於孔門政事之科。朱一新將教學內容分為文學、政事、言語三科，且以為可以「專治一門」。如許措施他明言是仿照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制度而來，這就足證專課生制度對分科教學法的提出的確極具啟發意義。然則陳澧的四科論同他早年身為專課生的受教背景確當緊密相關。

專課肄業生制度對陳澧如此重要，我們不能不對它的緣起作一交代。³⁹陳澧〈離經辨志齋記〉謂：「阮文達公督粵，設學海堂課士。後十餘年盧敏肅公督粵，而錢給事儀吉來游，皆阮公弟子也。錢君言於盧公，取堂中士，課以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每人專習一書，其事四條，曰句讀、曰鈔錄、曰評校、曰著述。未幾盧公薨，其事遂罷。」⁴⁰所以錢儀吉（1783-1850）是此制的實際倡導者。對此事錢氏有文字回憶說：

予客廣州，故總督盧敏肅公屬予修《鹽法志》，竣，將告歸，公固止之，曰：「昔儀徵公築學海堂課士于此也，士多學古治經者，久而無以勸進之，恐中怠。幸子之來，其為我強留，必為粵士益。」予乃止，退惟所學，譾陋無以稱公意，乃與學長林（伯桐）、吳（蘭修）、曾（釗）諸君謀為專經課士法。⁴¹

但何故結果是「謀為專經」之法而不是其他辦法，錢氏及諸家文字中皆未曾

37 朱懷新，〈佩弦齋雜存跋〉，同上註，頁1783。

38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2，頁77。

39 關於專課肄業生制度的具體內容及各界專課生的情況，可參看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3.4(1934): 1-147。

40 陳澧，〈東塾集〉，卷2，頁266下。

41 錢儀吉，〈衍石齋記事續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9冊），卷1〈吳仁齋六十序〉，頁107下。

明言。

今考戴鈞衡（1814-1855）〈桐鄉書院四議〉，其中有「課經學」一條，殊堪討論專課肄業生制度者注意。戴氏先說道：「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爲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讀經未畢，輒孜孜焉於講章時文，迨其能文，則遂舉群經而束之高閣。師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學。當是時，不惟無湛深經術、明體達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故此繼謂：

處今之時而欲修明經學，非徐而引之、漸而入之，其勢不能以驟轉。今與諸生約，人各專治一經，以歲時會課書院，山長發問，每經舉數事，各就所能言以對。對一事者獎若干，數事，倍之。通全經者歲給膏火常金，通二經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十年之內，天才優者必能舉數經，中才必能通一二。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余之約諸生專治一經也，求三年之艾之說也。⁴²

按戴氏這裏「約諸生專治一經」，正是錢儀吉所謂的「專經課士法」。而戴氏乃明言其行此法的原因是廣大士子溺於科舉，導致經學水準太低，「其勢不能以驟轉」，故不得不如此「徐而引之、漸而入之」。由此可以提示我們，錢氏提出「專經課士法」並非其憑空而作此想，當亦與其時學海堂諸生之學問情況相關，故不得不實行這種「徐而引之、漸而入之」的辦法。

以作爲第一屆專課生「舉首」⁴³的陳澧爲例。道光十四年（1834）被選爲專課生時，陳澧二十五歲。他這時的學問情況如何呢？他嘗自言：「少時喜爲詩，年二十四歲始棄。」⁴⁴而〈與陳懿叔書〉則謂：

澧十五六歲時，篤好爲詩，立志欲爲詩人，稍長知有經史之學，雖好之，不如好詩也。……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國珍）同舟爲詩唱和，玉臣專《毛詩》之學，雖與澧唱和，心弗善也。而澧刻意爲之。玉臣曰：「君自視其詩去古人幾何？」澧始愧汗自失。會試不中，留京師，猶時時爲之，與同年翁藥房（同書）唱和。先師程春海（恩澤）侍郎爲澧言，近人詩多因臥紙上，澧呈所爲詩，侍郎大喜曰：「此能於紙上躍起者。」是時年二十六矣。嗜好乃益多，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

42 戴鈞衡，《味經山館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45冊），卷1，頁581下-582上。

43 汪宗衍，《年譜》，頁17。

44 同上註，頁16。

詞、篆隸真行書，無不好也、無不爲也。⁴⁵

綜合這兩處文字來看，我們可以確知陳澧被選爲專課生時，尙大致處於從「篤好爲詩，立志欲爲詩人」向愛好經史小學等各種學問過渡的階段。⁴⁶而在此之前，他同經史之學的接觸只有過兩次，皆在其十八歲那年。一是張維屏（1780-1859）教他讀《四庫提要》，對此他有〈感舊詩〉云：「我年未弱冠，初見張南康。請問讀書法，乞爲道其詳。答云四庫書，提要契其綱。千門兼萬戶，眞如古建章。從此識門徑，漸可升其堂。」一是曾「問經學於侯康（1798-1837）」。⁴⁷這兩次經歷發生的作用如何呢？他曾回憶說：「余之治經自《易》始，時方弱冠，讀漢、唐、宋及近儒說《易》書三年，茫然無所得。」⁴⁷可見他雖問學於張、侯二人，但對經學仍舊未能「識門徑」。作爲所舉十名專課生之首的陳澧，其時經史之學的基礎尙且如此，其他人與他相較，自亦不過伯仲之間。所以由此看來，錢儀吉建議實行「專經課士法」，恐怕也是針對其時其地士子的實際情況而採取的「徐而引之、漸而入之」的辦法。⁴⁸

45 陳澧，《東塾集》，卷4，頁297上。

46 清代粵東詩風甚盛，桂文燦（道光二十九年舉人）《經學博採錄》卷1說：「粵東自國初以來，詩壇最盛。」（《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179冊），頁4上。按廣東人林明倫（？-1757）嘗謂：「吾鄉自梁藥亭三家（梁佩蘭、屈大均、陳恭尹）後，學者甫離句讀，便束書不觀，競爲浮詭靡曼之詩，妄意得嗣三家之風流。」《穆庵遺文》〈答關橋孺書〉，見高明總編，《清文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書牘類〉，頁1102。山西人檀萃於乾隆中葉遊歷粵中後亦謂：「僕客粵三年，居羊城者久，見士大夫好爲詩社，寫之於花宮、佛院，牆壁間俱滿。」《楚庭稗珠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卷4「詩社」條，頁139-140。可見桂氏所言不虛。陳澧早年「篤好爲詩」蓋與這種風氣有關。

47 以上三處引文俱見汪宗衍，《年譜》，頁11-12。

48 其實在學海堂設立之初，不僅是其中的肄業生，即便是其中擔任教學的學長，其整體的經學水準也不高。李緒柏已注意到，學海堂是在一個由廣州士人組成的名爲「希古堂」的文社基礎上擴建而成。見《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頁38-39。據吳蘭修（1789-1839）說：「道光紀元，余與……諸子結希古堂，課治古文辭。越二年，阮宮保師立學海堂以廣之，兼治經解詩賦，與課者數百人，可謂盛矣。」陳在謙輯，《國朝嶺南文鈔》（道光十二年刊本），卷17曾鈞〈希古堂文課序〉附，頁6b-7a。後來譚宗浚在〈後希古堂文會序〉中也說：「往者道光初，嘉應吳石華蘭修、南海曾勉士鈞兩先生結希古堂會，以古文相砥礪。」《希古堂文甲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64冊），卷1，頁327下。可見希古堂是一個講習古文辭的文社，其宗旨與阮元（1764-1849）提倡

(二) 考據與義理的層面：兩通之

章太炎和劉師培曾對陳澧的「漢宋調和」有過著名的評判。章氏謂陳澧「鳩合漢宋，爲《（漢儒）通義》及《（東塾）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盍，以爲比類。此猶掄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刊色理同者」。⁴⁹劉師培的意見與章氏絕似，以爲「澧學鈎通漢宋，掇引類似之言曲相附和」。⁵⁰按章、劉二氏所指出的「鳩合漢宋」、「鈎通漢宋」，即是陳澧在考據與義理這一層面提出的「兩通之」的漢宋調和論。

前文討論陳澧的學術歷程時，已經引及他在〈與徐子遠書〉中希望「義理、考證合爲一」的話。具體言之，他的看法其實與其前及並世儒者一樣，旨在強調經學研究中考據和義理不可分割，考據必須上通義理，而義理必須來自於考據。下面這段話最能體現他的觀點：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恐啓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句句說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微言大義從讀書考古而得」，此二語庶乎無弊矣。⁵¹

錢穆嘗謂：「東塾講學，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後義理明』之見解。」⁵²按陳澧認爲「庶乎無弊」的「微言大義從讀書考古而得」，的確正是此意。所以陳澧所謂兼采宋學，其意不過以爲治經須求義理而已，即「經不可不解說，但不可只解說其文，而不

的經史考證之學相當不同。而學海堂首任八位學長中，有七人爲希古堂人士。見《清代廣東樸學研究》，頁 39。這決定了設立之初的學海堂的整體經學水準並不會很高。所以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致信陳壽祺（1771-1834）說：「粵中學術故不及閩，近日生於書院中立學海堂，加以經史雜課，亦略有三五佳士矣。」見陳壽祺，《左海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96 冊），卷首，頁 58 上-下。陳壽祺回信說：「羊城新拔三五佳士，由夫子立學海堂精舍，養之教之之功，異日可漸與浙中人物頡頏矣。」《左海文集》，卷 5〈上宮保尙書儀真公書〉，頁 196 下。據此可知在時人眼中，道光初年學海堂諸子經史之學的水準並不甚佳，他們欲「與浙中人物頡頏」還尚待「異日」。

49 章太炎，《檢論》（清儒），見朱維鈺點校，《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477。

50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頁 161。

51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190。

5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681。

尋繹其理」。⁵³這與宋明理學並沒有關係，誠如他所說，「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⁵⁴因而他所面對的這一層漢宋之爭，其實只是清代漢學自身內部的問題。這一正面觀察的結果也正可與前文從他學術歷程角度觀察的結果相互印證。

真正的經學都是考據與義理合一的，而鄭玄和朱熹都是懂得真正經學的大儒，那麼他們的經學就不能不都是考據義理無所偏頗而彼此符同的。這是陳澧的漢宋調和論自身必然推導出來的結果。其遭章、劉二氏之譏，良有以也。《東塾讀書記》中，尤其是〈鄭學〉和〈朱子書〉兩卷，基本上就在發揮此「鳩合漢宋」之意。我們只略舉一例以見其大概：

王西莊（鳴盛）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精研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澧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⁵⁵

所謂「程朱即漢儒意趣」，亦即前文所謂的「朱子之爲漢學」之意。

這個「兩通之」的漢宋調和論中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陳澧雖然認爲鄭、朱之學符同之處甚多，但他下筆是很有分寸的，他可以說「朱子之爲漢學」，卻從不說「鄭君之爲宋學」（即如上引文中「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與「程朱即漢儒意趣」二語，意思輕重也微有不同）。這頗可見陳澧畢竟仍是「漢學」中人，「漢學」在其心中仍比「宋學」更具正面意義。⁵⁶他嘗

53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184。

54 同上註，頁189。

55 陳澧，《東塾讀書記》〈鄭學〉，頁276。陳澧既引王鳴盛（1722-1797）言，表明「鳩合漢宋」並不是他的發明。焦循（1763-1820）亦嘗在其《里堂家訓》中說：「朱考亭彙集群言，衷以己見，其說經之旨與康成同。……不執己亦不因人，漢之康成如是，宋之考亭亦如是。朱子之徒，道學爲門戶，盡屏古學，非也；近世考據之家，唯漢儒是師，宋元說經棄如糞土，亦非也。」對此，王大隆《里堂家訓跋》有云：「謂朱考亭之學同符康成，……則深病當時爲考據之學者，門戶私見牢不可破，故爲會其通。後來陳東塾溝通漢宋，而先生實爲先覺。」《合眾圖書館叢書》第11種（上海：上海合眾圖書館，1943），無頁碼。是則「漢宋調和論」自乾嘉時代即已存在，那麼清代經學是否如通常所謂由「漢宋之爭」走向「漢宋調和」，其實頗值反思。

56 李慈銘（1829-1894）曾評論陳澧：「其意實不滿宋學，而故爲門面之語，亦可不必。」由雲龍輯，《越縕堂讀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東塾讀書記〉，頁1223。按李氏

說：「一朝有一朝學術，漢經學、南北朝唐人義疏、宋道學、明忠義、本朝經學。」⁵⁷本朝與漢朝的學術都是「經學」，則在他看來本朝之學畢竟更傾向於「漢學」。又謂：

今予所論著者，乃經學也，漢學也，鄭學也。周公居東非東征；孔子作《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匯；孟子教齊、梁之君王天下，時周已非天子。鄭君實懷明德，此等乃其荦荦大者，非如近人零碎纖屑無關要緊之經學耳。⁵⁸

對這段文字，其整理者楊壽昌有按語謂：「《讀書記》所論著者，不止經學、漢學、鄭學，參觀他條及今《讀書記》所已印行之各卷自明。此條所言，特偶舉一端以為例耳。」⁵⁹按楊氏所言，恐未體得陳澧之意。陳澧當然知道其所論著有在經學之外者。他此處之意不過在針砭當時經學「零碎纖屑」之流弊而已。所當注意的，乃是他認為他所講的「經學」也就是「漢學」、「鄭學」，而並不說成是「宋學」、「朱學」。這正是因為在他意中，朱子之學就是漢學、鄭學，但卻不能反過來，說鄭學也就是宋學、朱學。「漢學」包得住「宋學」，「宋學」卻包不住「漢學」。故他又有言謂：

詆宋學者，能為許鄭之學；詆漢學者，不能為程朱之學也。⁶⁰

「漢學」之分量畢竟仍較「宋學」為重，於此顯然可見。楊壽昌按語謂：「此即謂程朱之學不能離漢學也。」⁶¹此言方才有得陳澧之意了。

然而陳澧雖然能提出考據與義理「兩通之」的調和論，但落實到治學實踐上時卻頗感為難。有一天深夜裏，他感慨地記到：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來年稍知之，而精力已衰，加以離亂死亡迭至，學侶甚希，又多貧乏。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土頗寬，而不能種禾。未知命之短長，世之治亂，後來如何。尚能讀書否？中夜尋思，不覺惘然也！⁶²

謂陳澧「故為門面之語」或未免言之稍重，但謂「其意實不滿宋學」，則確不為無見。

57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78。

58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179。

59 同上註，頁179-180。

60 同上註，頁193。

61 同上註，頁193。

62 同上註，頁202。

錢穆針對這段話評論道：「觀其《學思錄》要旨，真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凡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此，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⁶³按錢穆在引用陳澧這段話時省略了從「未知命之短長」到「不覺惘然也」一句，這樣他當然可拈出「基址頗大，田地頗寬」八字來為其所用，但實際上，完整地看，這段話的重心實應是另外八個字，即「不能起屋，不能種禾」，否則末句的「不覺惘然」就意無所屬了。

陳澧究竟在「中夜尋思」到了什麼而使他「不覺惘然」呢？楊壽昌的按語頗可幫助我們理解：「其曰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者，非不讀書也，先生自認為讀書之法尚未善也。此如先生〈朱子語類日鈔序〉所謂『澧早年涉獵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也。《東塾集》卷四有〈與陳懿叔書〉說為學經過，即此意。……先生〈學思錄序〉亦說此事，此等處可參看。」⁶⁴由此楊氏提示我們，陳澧的治學旨趣在中年發生過一次變化，他的感慨就是針對自己中年以後的學問而發的（故謂「此時」）。〈學思錄序〉前文已有引及，大旨與〈朱子語類日鈔序〉同，而〈與陳懿叔書〉謂：「自爾以來二十餘年，不惟不學詩、不學書，乃並小學音韻之屬亦皆輟業，近年惟讀經史日有課程，如學童初入塾者。」⁶⁵按這通書信可知，「自爾以來」是指自二十六歲以來，也是表明陳澧中年前後治學有一個變化。而最能說清他這一變化的是他六十四歲時寫的〈復劉叔俛（恭冕）書〉：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為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為《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⁶⁶

可見陳澧在中年以前專心於訓詁考據，而中年以後則欲求經典的微言大義，希望合考據與義理為一，正所謂「不分漢宋門戶」。由此可知，他「中夜尋思」中所謂「開得基址頗大」、「墾得田土頗寬」，即是指他的學問「不分漢宋門戶」，然而與此同時，「不能起屋」、「不能種禾」八字也是指此而言。

6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689。

64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202。

65 陳澧，《東塾集》，卷4，頁297上。

66 同上註，頁296下。

這表明他的學術意願與學術實踐之間存在著差距。他自己也許已能「不分漢宋門戶」，但他不是自了漢，而是一心要金針度與人，如〈與徐子遠書〉謂：「漢學、宋學皆有基址，然後可以義理、考證合爲一矣。至過此以往又有流弊，則非吾輩之任。自古聖賢皆只救一時之弊，何況我輩。」⁶⁷可見他倡導「義理、考證合爲一」是要師法「自古聖賢」而挽救一世經學之弊。然而要肩負起這一「吾輩之任」卻殊非易事。他嘗有筆記云：「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學思錄》皆不能不發明此等議論。然恐世人因此更不讀經書，必須申明之曰：經不可不解說，但不可只解說其文，而不尋繹其理。」這是陳澧倡導合考據義理爲一之一例。此下楊壽昌按語云：

壽昌謹案此條下又系以一句云「引程子扶醉漢語」，蓋取其扶得東邊倒了西邊之語，以明恐斤斤但借經書爲經解題目之不可，而人遂不讀經，欲救一弊，反生一弊，故引程子之言以防之也。立言之難如此，先生之心苦矣！⁶⁸

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即陳澧感到「不能起屋」、「不能種禾」的原因所在。他這種「欲救一弊，反生一弊」的憂慮，筆記中所在多有。⁶⁹所謂「中夜尋思，不覺惘然」，正因爲「先生之心苦矣」。

同樣倡導合考據義理爲一的朱一新可以爲我們提供一個更爲有趣的例子。從中可以看到，即便是漢宋調和論者自己，也往往難以做到考據義理無所偏執。前文曾引及朱氏〈擬星岩書院章程〉「學規」一目有「分經學、史學、詞章爲三科。小學、性理，經學之屬也」云云，他以小學、性理爲「經學之屬」，顯然是在調和漢宋，以考據、義理並爲經學之一部分。但同篇稍後論各科應先閱之書時，他卻說：

如治經，則《皇清經解》；治小學，則《玉篇》、《廣韻》；治宋學，則諸儒

67 陳澧，《東塾續集》，卷4，頁175。

68 以上兩段引文俱見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184。

69 比如筆記中又謂：「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同上註，頁191。

語錄；治史學，則《通典》、《通考》；治地志，則中外輿圖、《方輿紀要》、《海國圖志》。⁷⁰

這樣，當理論上考據義理合一的「經學」落實到「治經」這一實踐的層面時，又完全落在考據一邊了（《皇清經解》）。再來看朱氏在教導兒子的一封信裏說：

爲人道理並無奇異，只在五倫中求之，五倫道理一言難盡，仍在經書中求之而已。⁷¹

按朱氏有〈答門人孫慕韓書〉云：「窮理者，窮此倫常日用之理。」⁷²「五倫道理」就是「倫常日用之理」，所以朱氏要兒子「在經書中求」「五倫道理」，也就是要兒子通過經書以「窮理」。而「窮理」的經學顯然是宋學的擅場，因為「性理之學必以宋儒爲歸」。⁷³那麼在這個特殊的語境中，朱氏自當要其子多讀宋儒經學書爲是。然而信中他教兒子讀經時卻這樣說：

《爾雅》有郝氏（懿行）《義疏》，《說文》有段氏（玉裁）之《注》，皆精博絕倫。小學書極多，可先看此二種，不通小學，不能治經。二書均刻《皇清經解》中，近有續刻，其中佳者亦多。若《通志堂經解》，皆宋元明人說經之書，佳者不多。⁷⁴

朱氏認爲「窮理」之學宋儒自較近世考據諸儒爲優，他教其子讀經的目的也是要其「窮理」，但在治經的具體過程中，卻又要求走考據諸儒的路子，而以爲「宋元明人說經之書」不可取。朱氏的這段文字只是一封家書，並非專門論學之文，因此正可視爲其潛意識的自然流露。他在經學理論上要求合考據義理爲一，且認爲義理「必以宋儒爲歸」，可是在經學的實踐上，又往往不自覺地偏在了考據一邊。考據、義理究當如何統一，終難處理得完滿。

陳澧其實也同朱一新一樣，往往在有意無意間偏向考據，所以正如前

70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卷下，見氏著，《拙齋叢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第272種），頁1712。

71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卷上〈示兒萃祥〉，頁1679。

72 朱一新，《佩弦齋文存》，卷下，見氏著，《拙齋叢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第272種），頁1342。

73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1，頁32。

74 朱一新，《佩弦齋雜存》，卷上〈示兒萃祥〉，頁1672-1673。

文已言及的，他會有「朱子之爲漢學」的看法，會有「詆宋學者能爲許鄭之學，詆漢學者不能爲程朱之學」這種表示「程朱之學不能離漢學」的意見。對這個問題，朱氏也許沒有意識到，而陳澧卻自覺到了，以致深夜裏發出「不能起屋」、「不能種禾」的「惘然」感歎。要言之，陳澧的例子體現了其時經學的狀況：理論上，考據、義理合一仍具有正當性；但實踐中，考據、義理分途已成難以挽回之勢。⁷⁵

四、「所學不可以語人」：陳澧的處境

陳澧對不同層面的漢宋之爭採取了不同的調和方式，對「文學」與「德行」是「兩分之」，對考據與義理是「兩通之」。他的這種漢宋調和論忠實地反映了其時的儒學狀況。道光時候的沈垚（1798-1840）以爲：

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於形聲訓詁則不可。⁷⁶

沈氏以爲「窮經」與「進德」（即陳澧所謂「文學」與「德行」）乃各有各的方法與原則，屬於不同的領域，所以「窮經」必須依靠「形聲訓詁」，而「進德」則同「形聲訓詁」並不相干。這就是說，求知識有求知識的方法，修道德有修道德的手段，二者是不同的學問，須依照不同的範式來處理。此見解表明其時之儒者已經在理論上承認「窮經」與「進德」各自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了。而與此同時，在「窮經」這一層面上，「由考據通義理」依舊是必須遵循的原則，儘管實踐中考據往往與義理脫節，但理論上二者仍不允許分割開，義理仍是窮經的目的所在。因此在乾嘉濃厚的考據風氣之下，阮元可以

75 錢穆曾評論焦循說，其「《論語通釋》專言義理，乃早成之書，未刻入《雕菰樓全書》，而別爲《論語補疏》，與《易通釋》、《孟子正義》諸書，均以發抒義理之言與考據、名物、訓詁者相錯雜出，……故其先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有理學者，至是乃感義理之與訓詁考據，仍不得不分途以兩全。」又評論戴震，以爲「考據與義理，在東原自身，顯屬兩事，未能並歸一體」。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26。蒙文通也以爲，「戴震、焦循雖有理論著作，而又和他的整個學術脫節」。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3），頁 8。蓋考據與義理難以合一，是乾嘉以降的普遍問題，無怪乎陳澧等人的漢宋調和無從措手。

76 沈垚，《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25 冊），卷 8（與孫愈愚（燮）），頁 468 下。

說：「經非詁不明，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許氏《說文》以字解經，字學即經學也。」⁷⁷但一旦嘉道以降考據的權威稍墜，陳澧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問：「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⁷⁸可見雖然經過乾嘉時代實證之風的洗禮，考據也仍舊不能脫離義理而獲得理論上的獨立地位。然而「理論正確」的陳澧卻又難以在實踐中將他的理論落實與推廣。理論與實踐的衝突，表明清代漢學已經陷入深刻的自我矛盾之中。

尤值注意的是，陳澧的學問不僅有「不能起屋」、「不能種禾」的困難，而且無法得到旁人的理解，一種「獨學而無友」的孤寂感籠罩著他。且看下面幾段文字：

讀書畢，悽然泣下，自古來獨自讀書如我者，真可悲也。

每讀書至夜半，飲酒下之，而酒冷燈昏，心光炯然，上下千年，無人可談，乃嘆曰：可談者，唯酒意耳。

朋友我不敢輕議，門人又難得，以為得而又非者屢矣。兒子可教者又已夭死。看來我只合緘口不道學問，靜以待死，不必與活人說話也。否則與草木相對而已。此我所以欲種學海堂花木也。不必種學海堂花木，並不必修書齋花木，只有全不理人為是。

我今日酒醉飯飽，讀書既倦而睡，厚衾煖褥，不可謂非福也。然而所學不可以語人，著書不可以自成，耿耿然而無與語，亦窮矣哉。⁷⁹

這是陳澧《默記》中的文字。據汪宗衍說：「此先生未成之作，每條間有紀年，均庚申、辛酉間所記。」可知其作於咸豐十年至十一年間（1860-1861），當陳澧五十一、二歲時，距他開始寫作旨在調和漢宋的《學思錄》已經有兩三年了。陳氏嘗自謂：「予之學但能鈔書而已，其精者為《漢儒通義》，其博者為《學思錄》，其切摯者為《默記》，不復著書也。」⁸⁰以「切摯」二字為言，可見《默記》所記確是陳澧內心的真切感受。

77 阮元，《定香亭筆談》（《叢書集成初編》第260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4，頁153。

78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4，頁301上。

79 以上四段引文俱見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50、151、163、164。

80 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汪宗衍，《年譜》，頁85。

有兩點情況需稍作說明。其一，筆記中提到「兒子可教者又已夭死」。按陳澧長子名宗誼，因病卒於咸豐九年（1859），年僅二十一歲。中年喪子，對陳澧打擊極大，痛念宗誼的感慨在其文字中屢見不鮮，他的心境之惡劣與此密切相關。不過陳澧的悲慟並不僅僅在於一位父親失去了兒子，他還有親情之外的另一層更深的傷心。且看他在〈亡兒期年祭文〉裏的哀痛之辭：

嗚呼！汝死忽忽一年矣。一年之中，無日不思汝，汝知之否耶？我近日閱歸震川文集，見其〈思子亭記〉，潸然流涕。我今所居之室，亦欲名之爲思子室也。震川之言曰：吾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此不啻代我言之也。且我之窮窮於震川，震川之述其子，但曰文秀而已，汝之有志學問，以古賢自期，又豈震川之子之比哉！我於窮老晦亂之時獨守所學，而汝和之。嗚呼！人世茫茫，性情相合，學問議論相契者，千萬人中無一二人，不意近得之於其子也。行年五十，無事不屯蹇，惟此爲平生最得意事，而一旦失之，能不悲哉！⁸¹

可見宗誼不僅是陳澧的兒子，同時也是他最親密的志同道合的學侶。宗誼的夭折，使陳澧感到完全墜入了「獨守所學」的景況，「千萬人中」，再也找不到那「性情相合、學問議論相契」的「一二人」了。所以宗誼夭折對於陳澧而言，喪失學侶的意義比喪失兒子的意義來得更爲重大。

其二，咸豐十一年（1861）陳澧撰〈朱子語類日鈔自序〉謂：「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與講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笑矣。其子又短命而死，暮年屯蹇，又可悲矣。」⁸²可見陳澧的「寂寞」感在宗誼生前早已有了，「其子又短命而死」只是加重了這種感覺。同治五年（1866）他作〈復鄭小穀書〉云：「（澧）向來有好談論之病，然對俗人淺人不可談，對少年人不可談，對生客貴客尤不可談。近來甚少可談之處。思故友於九京，望先生於千里，何處寫我心哉！」⁸³大約三、四年後又有〈與楊黼香書〉云：「長子死，今將十年，偶一念及之，猶爲淚下。是時所見之物，皆有悲態，所聞之聲，皆有悲音，漸至竟夜不寐，以酒取醉，乃暫時合眼。」⁸⁴據此足見陳澧的孤寂感是長期持續的，並非只是喪子後短期的陣痛。

81 陳澧，《東塾集》，卷6，頁335下。

82 汪宗衍，《年譜》，頁88。

83 陳澧，《東塾集》，卷4，頁293下。

84 汪宗衍，《年譜》，頁80。

對陳澧的孤寂感應該怎樣理解呢？陳澧在生前就已經頗有聲名了，他自己即曾說過：「僕今日有虛名，人皆謂之有經學。」⁸⁵因此他的寂寞並無關於聲名的顯晦。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他的學問本身。據稍後於他的人觀察，他的學說在那時頗為「流行」，清末的胡思敬（1870-1922）即謂：

近日粵中學派多宗朱次琦、陳澧。……澧漢宋兼通，無門戶異同之見，其學流行最廣，番禺林國廣、林國贊、趙子韶、石德芬、長沙胡錫燕皆其入室弟子，今達而在位者有梁鼎芬、文廷式、于式枚。⁸⁶

李詳（1859-1931）也發現，「粵中高材，出遊四方，皆以曾事陳君，矜為標識」。⁸⁷然而在如此門牆欣榮之貌下，陳澧卻於中夜慨歎「門人又難得」，至不能寐。這種強烈的反差表明，雖則「其學流衍最廣」，但在他自己看來，並沒有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學問，所以他又會有「所學不可以語人」的無奈。他的學問在當時究竟是怎樣一番處境，以至於讓他感到如此寂寥呢？

儘管當時的許多具體因素現在已經無從知道，但通過比較他身後所受的不同評價，我們仍可以推知大致的情形。這些評價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即大體相較而言，越是離乾嘉考據傳統近的學人，對他的評價越低；越疏離於這個傳統的學人，對他的評價越高。章太炎、劉師培和鄧實皆乾嘉經學嫡傳，⁸⁸對陳澧評價最低（已見前引文），以至於謂「其學至無足觀」。而歸宗於惠派漢學又所學頗雜的葉德輝，⁸⁹對陳澧的批評就較章、劉等稍緩和。

85 陳澧，《東塾續集》，卷1〈為菊坡精舍門人論學〉，頁28。

86 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卷1「朱陳學派」條，頁20。

87 李詳，《藥裏慵談》，卷6「陳蘭甫先生冒籍弟子」條，見《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735。

88 按鄧實師從簡朝亮（1851-1933），以師承而言算是調和漢宋的朱次琦（1807-1882）的再傳弟子，但其學乃在乾嘉傳統之中。錢穆嘗謂：「從（朱次琦）學有簡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學，仍是乾嘉經學餘緒耳。」〈朱九江學述〉，見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卷8，頁322。據此觀察，則鄧實之學也是「乾嘉經學餘緒」。

89 1920年，日本學人諸橋轍次在中國遊學時與葉德輝有過一次筆談。諸橋謂：「湖南是清末學者之淵藪。若曾文正公、王闓運、王先謙諸先生，概觀之於歷代儒林傳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謝。此間獨有先生之學深識高，固是湖南學界之幸，抑亦中國學界之幸也。」見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63。可是葉德輝並不同意諸橋的話，他的反應是立即與湖南人的學問劃清界

據他說：

東塾先生遺書，尤爲士大夫所推重。鄙人亦購置一冊，朝夕研求，覺其書平實貫通，無乾嘉諸君囂陵氣習，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人，眾口交推，良非虛溢。及讀《漢儒通議》一書，於此心始有未洽。蓋以性與天道，聖門且不可得聞，此事本非漢儒所究心，何必爲之分門別類。⁹⁰

他這裏對陳澧的評價顯然與鄧實說的「其學至無足觀」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對陳澧「鳩合漢宋」的《漢儒通義》一書則不能首肯，故在序其《輶軒今語評》時說：

亭林，命世大儒，當時漢、宋之幟未張，故其著書無漢無宋，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師之固所願也；蘭甫人品亦篤實可風，而其講學調和漢、宋，在門戶紛爭之後，所謂舍田芸田，不可法也。⁹¹

「調和漢宋」是陳澧學術核心所在，葉氏譏之爲「舍田芸田」，以爲「不可法」。在這一點上，他的態度同章、劉等人就無甚差異了。蒙文通是通過廖平（1852-1932）而上繼劉逢祿（1776-1829）、陳壽祺、喬樅（1809-1869）父子及陳立（1809-1869）的今文學一脈，與章、劉、葉等的古文學相較，稍屬「異端」。他對陳澧並無斥責，但也無甚褒揚。他在其《經學導言》〈緒論〉中說：

近二十年間漢學的派別很多，……一部分是陳蘭甫、桂文燦的餘波，是主張漢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別今古的，卻還有乾嘉風流。這兩派都是前時代的餘韻，也不甚惹人注意。⁹²

所謂「不甚惹人注意」，其實就是不甚惹他的注意。所以他對陳澧的學問基本是抱一種不予置論的態度。梁啟超是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

線。他說：「鄙人學派與湖南不同。鄙人原籍江蘇蘇州吳縣，有清一代經學之漢學肇基於此地。即世稱昆山顧炎武、吳縣三惠是也。曾文正爲古文家、王闕運爲詩文家、王先謙爲桐城古文家，皆非漢學家也。鄙人於三公皆不相同。」頁163。葉德輝說曾氏與二王「皆非漢學家」，而他自己則自命爲傳「吳縣三惠」之風的「漢學家」。

90 葉德輝，〈與羅敬則大令書〉，見氏著，《卮園論學書笈》（《叢書集成續編》第88冊），頁651上。

91 見蘇輿編，《翼教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卷4，頁70。

92 蒙文通，〈經學導言〉，見《蒙文通文集》第3卷《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12。

1857) 及康有為的今文學一脈，距乾嘉的傳統較蒙文通更隔一層。他不僅對陳澧毫無貶斥，還視之為與惠棟（1697-1758）、錢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及焦循等並列的「大學者」。⁹³而同以上諸人相比，錢穆與乾嘉傳統最為疏離，對陳澧的評價也最高，以至視之為晚清以降首出的學術楷模，於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陳蘭甫〉一章之末大聲疾呼：「安所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此余於東塾之一編，所尤拳拳深致其嚮往之意也。」⁹⁴

這種評價結果無疑直接與陳澧本人的學術相關。按前引〈復劉叔俛（恭冕）書〉，可知陳澧的學術在中年前後有一個大變化。正如他的再傳弟子何藻翔所謂：「東塾中年後，舍棄從前考據舊習，專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⁹⁵故大體言之，陳澧早年尚在乾嘉經學考據的矩矱之中；中年以後則更欲進求微言大義，雖仍強調考據義理合一，然與前此相較，已不免更多強調義理，對乾嘉考據風尚已頗為不滿。比如他在《默記》中說：

本朝諸儒，予不喜陳啓源、惠棟、王念孫、張惠言、劉逢祿。⁹⁶

又其自列《學思錄》大指第二、三條分別為：「救惠氏學之弊；救高郵王氏之學之弊。」⁹⁷惠棟、王念孫等人皆是乾嘉經學的頭面人物，尤其是王氏的小學訓詁，章太炎譽為「自魏以來，未嘗有也」，⁹⁸可謂代表了乾嘉經學之正軌，而陳澧卻以為流弊。他嘗在筆記中批評王氏父子說：

「宵爾索綯」，《毛傳》解為索絞，王氏《述聞》解為絞索，其實一也。而必斷斷辯之，豈不□哉！縱使王氏說是，亦如左右帶劍而已，而必欲求勝古人乎？一字之義不同而害及一句，一句之義不同而害及一章，則必辨之。若句

9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472。關於清代今文學內部的分派，可參看蔡長林，〈清代今文學派發展的兩條路向〉，見彭林主編，《經學研究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75-100。

9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690。

95 何藻翔，〈陳蘭甫先生遺稿跋〉，《嶺南學報》5.3-4(1936.12): 26。

96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66。

97 汪宗衍，《年譜》，頁69。

98 章太炎，《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三）》，頁474。

意猶是，則字義可不必辨矣。⁹⁹

按陳澧又嘗云：「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何不先於漢唐注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理義乎？」¹⁰⁰據此可知，上引他對王氏的批評是指責王氏但知解字義，而不知更有求義理的工作。然而王氏之所為恰恰體現的是阮元所謂的「字學即經學」的乾嘉精神。凡此皆在在可見中年以後倡導漢宋調和的陳澧已經與乾嘉唯考據是尚的潮流相當疏離了。¹⁰¹

將陳澧學術的變化與他身後所受褒貶的情況結合起來，我們便可以大體推知，中年以後的他之所以孤寂而難得解人，其原因蓋在於他的學術疏離了乾嘉以來專重考據的風氣。本來乾嘉漢學的治學範式是「由考據而通義理」，正如其理論代言人戴震（1723-1777）所言：「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¹⁰²陳澧所亟亟從事的「漢宋調和」其實正是在千方百計地重申與堅持這一範式，以挽住因考據一家獨大而導致的考據與義理兩層面之間的分裂之勢。但他的努力所換來的卻是一個如此弔詭的結果：他這位堅持漢學完整理念的人，竟完全得不到並世漢學諸人的理解！陳澧這種尷尬處境其實正反映了整個清代漢學遇到的困境——漢學理念（由考據而通義理）與漢學實踐（有考據而無義理）之間已經脫節。這種脫節所造成的緊張，就是所謂漢宋之爭。

99 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2.6): 210-211。

100 同上註，頁184-185。

101 誠如胡楚生所說：「亭林、蘭甫二先生之研治經學，蓋皆屬於經書之中，探尋義理者也，試取《日知錄》與《讀書記》，就其內容，細加抽繹，則不難察知，此二書也，較諸清代乾嘉以下，考證之作，若《讀書雜誌》、《經義述聞》、《讀書舛錄》、《左海經辨》、《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筭逐》、《筭樸》等等，考一事之真偽，訂簡策之脫漏，明古籍之通假者，其精神意趣，迥不相同矣。」〈陳澧治經方向與顧亭林之關係〉，見氏著，《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299。

102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湯志鈞校點，《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14。

五、結 語

現代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傳統「儒學」的特性。如果就治學的各個層次而言，儒學大致是一種講究體用兼備、由下學而上達、學以致用的無所不包、打成一片的學問。在清季遭到西學的劇烈衝擊以前，這個學術體系基本上是相當穩固的，並按照它自己的特性在演進。段玉裁在總結其師戴震的學術理路時說：

先生之治經，……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¹⁰³

這是身在傳統儒學語境中的儒者的自白，可知清代中期儒學在理論上仍舊是一個整體，最終目標是要求「考核」（考據）、「性與天道」（義理）、「施政利民」（致用）一以貫之。

但如本文通過陳澧的個案所看到的，當儒學發展至「漢學」的階段後，考證的興趣被激起而難以扭轉，「窮經」與「進德」、「考據」與「義理」之間愈發離異，逼使儒學內部的各部分日益分道揚鑣、各不相干。而與此同時，作為整體的「儒學」的理念依舊強固，又絕不能允許這種分裂情況真正出現。這種勢已「不得不突破」但又確實「不得突破」的局面，既在儒者們的內心造成了緊張，也在學術界掀起了爭論。此即所謂「漢宋之爭」。

從根本上說，「儒學分裂」的趨勢是由儒學自身的發展引起的。乾隆六年（1741）的舉人趙繼序曾說：

訓詁、制度、義理，皆儒者所當研究，或因精力不及，分門別戶，互相刺謗，學者不知其方，流弊滋甚。¹⁰⁴

是趙氏告訴我們，儒學界「分門別戶」的原因正在於隨著儒學的發展，其內部路徑太多，以致儒者「精力不及」，不得不各擇一業分頭進展。到乾嘉時代，這一趨勢變得尤為明顯。桂馥（1736-1805）曾回憶說：

103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震集》，頁452。

104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第10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儒林下〈徐文靖〉附〈趙繼序〉〉，頁420。

（余）三十後與士大夫游，出應鄉舉，接談對策，意氣自豪。周書昌見嘲云：「……涉獵萬卷，不如專精一藝，願君三思。」馥負氣不從也。及見戴東原，爲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讀經傳，故其學有根據。又見丁小雅〈自訟〉云：「貪多易忘，安得無錯。」馥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¹⁰⁵

根據這段回憶可見，「專精一藝」已經是乾嘉時代一種普遍的治學理念了。所以當有人質問章學誠（1738-1801）說：「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驚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¹⁰⁶章氏即回應道：

道欲通方而業需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¹⁰⁷

按章氏之言固不免有爲他自己所爲與並世之經學考證異趣作辯解之意，然與上引趙氏之言合觀，可知也未嘗不是當時儒學發展趨勢之實錄。「分門別戶」確實是「理勢然也」。即便是一代通儒戴震，江藩（1761-1830）也說他「學以緯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¹⁰⁸則通儒戴震又何嘗不是一位「專家」呢。

如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所說：「從明代的『業餘性研究』到清代『專業化』的轉變展示了儒家學者地位和角色的重大轉變。」¹⁰⁹的確，「專業化」使得清代儒學在各個方向上都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儒者們也漸漸具有了某種類似於現代學人的「地位和角色」。但是，無論這個「轉變」有

105 桂馥，《晚學集》（《叢書集成初編》第2518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6〈上阮學使書〉，頁165-166。

106 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56），內篇二〈博約下〉，頁51。

107 同上註。

108 江藩，《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62。按雍乾間人龔煒（1704-？）嘗謂：「士至今日而談博學，難矣！漢當秦火之後，儒者蒐羅舊籍，殫精畢慮，始得以博洽名世。自漢以後，作者林立，卷帙日繁，泊乎唐宋，不知幾倍於漢矣。……又五六百年而至今，書籍之富，更非唐宋比矣。……李獻吉（夢陽）不讀漢魏以後書，豈是漢魏以後文字不足讀，恐亦讀不去耳！」《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5「書多難博」條，頁119-120。龔氏與戴震同時而稍早，對戴震一般「不讀漢以後書」的現象頗具瞭解之同情。

109（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48。

多麼「重大」，也最終不可能完全突破「儒家」的藩籬，否則清代思想界瀰漫一世的「漢宋之爭」就無從談起了。不妨套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話來說，清代的漢宋之爭大體上「仍是中國傳統世界內部的分歧，它證明的是傳統的穩固性，而非傳統轉化的象徵」。¹¹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清·檀萃，《楚庭稗珠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
-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56。
- 清·桂馥，《晚學集》，《叢書集成初編》第2518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
- 清·陳在謙編，《國朝嶺南文鈔》，道光十二年刊本。
- 清·焦循，《里堂家訓》，《合眾圖書館叢書》第11種，上海：上海合眾圖書館，1943。
- 清·阮元，《定香亭筆談》，《叢書集成初編》第2601-260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清·陳壽祺，《左海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9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刻本影印。
- 清·錢儀吉，《衍石齋記事續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道光刻咸豐四年蔣光燾增修光緒六年錢彝甫印本影印。
- 清·沈垚，《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七年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
- 清·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 清·劉恭冕，〈致劉恭甫書〉，《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四號（光緒三十一年四月），頁4ab。

110（美）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8。

-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
- 清·陳澧，《東塾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影印。
- 清·陳澧，《東塾續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輯第76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2(1931.7): 149-183；2.3(1932.6): 174-214。
- 清·陳澧著，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筆記遺稿〉，《嶺南學報》5.3-4(1936.12): 1-27。
- 清·黃以周，《儆季雜著》，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刊本。
- 清·戴鈞衡，《味經山館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咸豐三年刻本影印。
- 清·譚宗浚，《希古堂文甲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據清光緒十六年羊城刻本影印。
- 清·桂文燦，《經學博採錄》，《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三十一年刻敬躋堂叢書本影印。
-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編，《越縕堂讀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 清·朱一新，《拙齋叢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第27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蘇輿編，《翼教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 清·葉德輝，《郎園論學書笥》，《叢書集成續編》第88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第10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 王家儉 1994 《清史研究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 1997 《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美）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著，鄭大華、任菁譯 2000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東安選注 2002 《帷幄辭章——曾國藩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朱維錚點校 1984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 詳 1989 《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李緒柏 2001 《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 李慶編注 1999 《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汪宗衍 1972 《陳東塾先生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輯第763種，臺北：文海出版社。
- 車冬梅 2005 「晚清理學學術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 胡思敬 1997 《國聞備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胡楚生 1988 《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容肇祖 1934 〈學海堂考〉，《嶺南學報》3.4(1934): 1-147。
- 徐亮工編校 200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高明總編 1960 《清文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 1985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寅恪 200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三〉，收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湯志鈞校點 1980 《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黃愛平 1996 〈《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兼論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中國文化研究》1996.冬: 44-49。
- 蒙文通 1995 〈經學導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頁6-45。
- 蒙默編 1993 《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
- 趙所生、薛正興編 1995 《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暴鴻昌 1997 〈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1997.2: 64-70。
- 蔡長林 2002 〈清代今文學派發展的兩條路向〉，收入彭林主編，《經學研究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75-100。
- 錢 穆 1997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 穆 200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魏永生 1999 「清中晚期漢宋學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The Han/Song Debate in Han Studies and Its Deeper Significance in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Chen Li's Reconciliatory Perspective

Zhang Xun*

Abstract

Chen Li 陳澧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dvocates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Han and Song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Classics in the late Qing. Examining his theory, we find that despite constantly advocating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Song Studies, what he in fact accepted was merely Song scholar's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yili* 義理, to the point that he was not at all influenced by Neo-Confucianism. The Song Studies that interested him was not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rather, his life's work reconciling Han and Song was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an internal problem in Qing dynasty Han Studies, the aim of which was to stress and reiterate Han Studies original approach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doctrine (*yili*)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kaoju* 考據). This problem can be stratified into two layers. The first was the division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between *wenxue* 文學 (studying the classics) and *dexing* 德行 (morality), and the second was the tension between *kaoju* and *yili* in *wenxue*. Chen Li adopted two different ways of reconciling these two layers, namely to connect the two and separate the two. However, Han Studies scholars of the time could not comprehend

* Zhang Xun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Sichuan University.

his efforts, an awkward outcome that reflected the divor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an Studies, which was precisely at the root of the Han/Song debat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deeper implication of the Han/Song debate in Qing dynasty intellectual history was therefore this innate contradiction in Han Studies.

Keywords: Qing dynasty, Chen Li 陳澧, Han Learning, Song Learning, Han/Song debate, *kaoju* 考據

